

上帝之死与人民之死

韩少功

很多理论家面对权力、资本、以及媒体受众的时候,话不要说得太刺耳,大概是必要的服务规则。道德问题被软化为文化学或心理学的问题,绕开善恶这种痛点;如果可能的话,不妨进一步纳入医学事务,从而让烦心事躺入病床去接受仁慈的治疗。一个美国人曾告诉我:在他们那里,一个阔太太如果也想要个文凭,最常见的就是心理学文凭了。心理门诊正成为火爆产业,几乎接管了此前牧师和政委的职能,正在大谈“情商”或“逆商”一类时鲜话题。

据说全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至百分之三十二(2008年10月7日文汇报),而最近十二年里,我国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数分别翻一倍多和近一倍(2009年9月22日文汇报)。如此惊人趋势面前,人们不大去追究这后面的深层原因,比方说分析一下,“情商”或“逆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大体属实,而另一些不过是“社会病”,是制度扭曲、文化误导、道德定力丧失的病理表现。

病情似乎只能这样处理:道德已让人难以启齿,社会什么的又庞大和复杂得让人望而却步,那么在一个高技术时代,让现代的牧师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开一点药方,摆弄一些仪表,也许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也更让不少当权大人物宽心——他们是很关爱你们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对你们的抑郁、焦虑、狂躁、强迫、自闭之类无权干预,对写字楼综合症、中年综合症、电脑综合症、长假综合症、手机依赖综合症、移民综合症、注意力缺乏综合症、阿斯伯格综合症等等爱莫能助。你们是病人,对不起,请为自己的病情付费。

并非二十四小时内的都相关道德。很多牧师和政委曾挥舞道德大棒,其越位和专制不但无助于新民,反而构成了道德腐败的一部分。取消对同性恋的歧视,显然是对心理甚至生理差异的合理宽容,纠正了一大假案。不抹口红者对抹口红者不再声讨,吃鹿肉者对吃狗肉者不再质疑,也保护了文化多样性,让人类摆脱道德有色眼镜,重新活得五彩缤纷。这是另一方面的情况。不过,颁布精神大赦,取消道德戒严,广泛解放异端,让很多无辜者享受自由阳光,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有恶,并不意味着所有精神事故都像小肠炎,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只有物质化、技术化、医案化的解决之法。最近,已有专家在研究“道德的基因密码”,宣称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个人品德是由基因决定(2010年6月14日俄罗斯《火星》周刊)。如果让文章中那些俄国人、美国人、瑞典人、以色列人研究下去,我们也许还能发现

极权主义或民主主义的神经元?能发明让人一吃就忠诚的药丸,一打就勇敢的针剂,一练就慷慨的气功,一插就热情的生物芯片?能发明克服华尔街贪欲之患的化学方程式……即便这些研究不无道理,与古代术士们对血型、体液、面相、骨骼的人生解读不可同日而语,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实验室都无法冒充上帝。否则,制毒犯也可获一小份科技进步奖了——他们也是一伙发明家,也是一些现代术士,也在寻找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只是苦于项目经费不足,技术进步不够,药物的毒副作用未获足够的控制,可卡因和K粉就过早推向了市场。

道德的别名是价值观,其核心是义与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没有那么虚玄,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弟弟帮哥哥与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哥哥看来是可歌可泣的仗义。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争,对国族之外是争利,在国族之内是慷慨动人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还可能大爱无疆,爱及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银河星系,把小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此大爱其实也是放大的自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人类的家园,打理家园是确保主人的安乐。如果有人爱到了这种地步:主张人类都死光算了,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那他肯定被视为神经病,比邪教还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世俗,充满人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配方案,一种让更多人活下去或活得好的较大方案。一个人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

口,也让儿女吃一口,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纲领的道德义士——虽然在一个网络、飞机、比基尼、语言哲学、跨国石油公司所组成的时代,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犹太—基督教曾提交了最为普惠性的福利分配方案。“爱你的邻居!”《旧约》这样训喻。耶和華在《以赛亚书》里把“穷人”视若宠儿,一心让陌生人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神,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人为自家骨肉的情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神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

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乱力怪神”,不大习惯人格化、传奇化、神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神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头神明”之类玄语,但对人们头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人权”具有神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和“天道”,与“人民”是一体

两面,不过是道德的神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19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蕴含的人民情怀,在神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入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人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宗教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了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以及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性——毛以及他的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人。

不难看出,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人民”未死,只要“人民”、“穷人”、“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神圣光辉,传统道德就还有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情、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奔赴“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 Last Day(最后的日子),充盈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先人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

是一两代人入骨的亲历性记忆。他们内心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人对理性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飚,从19世纪到20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人民”是否也会走下神坛?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冷战结束之际,标举“人民”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暴、虚伪、贫穷、混乱等诸多内情震惊世人,使19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人民性”、“人民民主”一类词蒙上阴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理论家们温雅一点,却也权质疑“人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性、本质性、神圣性的概念,是否真有事实依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入棚户的码头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奴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潮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人与工人之间其实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则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交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人民”、“穷人”、“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

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一类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人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股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人民”正在被“股民”、“基民”、“纳税人”、“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以私有制、市场化为特征的竞争性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人民已经解体。特别是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情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人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总是比理性外交更火爆。地摊上的色情和暴力总是比经典作品更畅销。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商业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乱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阴癖打天下。在人民付出的人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人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日本)拉近距离。在这个时候,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精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底层男女,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人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人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商人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交际和组织,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人,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爱心模范,不时在粉色小散文或镏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人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个人见人爱的好东西。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神婆巫汉,也会在人多的地方推出“心灵鸡汤”(包括心灵野鸡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公电母,让人们喝得浑身冒汗茅塞顿开,明白利他才能利己的大道理,差不多是吃小亏才能占大便宜的算计——也可以说是理性。

不否定自私,但自私必须君子化。不否定贪欲,但贪欲必须绅士化。理性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可持续、更有效、特文明的高级个人主义,就是善于交易和互惠的无利不起早。这有什么不好吗?考虑到“上帝”和“人民”的联手远去,变“以义为本”为“以义为用”,放低一点身段,把减法做成加法,也不能及时给社会补充温暖,也不能缓释一些社会矛盾,而且是一种最便于民众接受的心理疏导?当一些人士因此而慈眉善目,甜言蜜语,道德发情能力大增,包括对小天鹅深情献诗或对小蝴蝶音乐慰问,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起码一条,相对于很多文化精英在道德问题上的逃离弃守和自废武功,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才子们精神追求的神秘化(诗化哲学)、碎片化(文化研究)、技术化(语言分析)、虚无化(解构主义等),

文化明星与神汉巫婆还算务实有为，不失为差强人意的替补。他们多拿几个钱其实于理不亏。

很多高薪才子并没有成天闲着。他们对道德的失语，其实出自一种真实的苦恼——或者说更多是逻辑和义理上的苦恼。说善心不一定出善行，这当然很对。说善行不一定结善果，这当然也很对。说恶是文明动力，再说到善恶相生和善恶难辨因此道德无定规，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层面来看，无疑更是大智慧，比“心灵鸡汤”更有学术含量也更有精英品味（坦白地说，我已受益不少）。不过，用诗化哲学、文化研究、语言分析、解构主义等等把道德讨论搅成一盆糨糊以后，才子们总还是要走出书房的，还是要吃饭穿衣的。书房里的神驰万里，无法代替现实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说，一位才子喝到毒奶粉，会觉得这是善还是恶？会不会把毒奶粉解构成好奶粉？会不会把奶粉写入论文然后宣称道德仍是假命题？会不会重申幸福不过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意见和叙事法，因此喝下毒奶粉也同样可以怡然自得……纸面上被他们争相禁用的独断论，一旦走出书房却变得无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喝，还是不喝，是一个问题。

生气，还是不生气，是后现代主义者无法绕过的学术大考。

价值多样化，诚然是实践者的智慧，是独断论者们曾经留下的盲区。面子对有些人而言是利益，对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交响乐是有些人的实惠，在另一些人那里却不值一提。有些人对宗教徒一厢情愿的关怀，还经常形善而实恶：把寺庙改成超市，说面纱不如露背装，强迫忍饥斋戒者赴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强烈仇恨，构成文化

误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有些人可以把豪宅当作地狱，把自由视为灾难，把女士优先看成男性霸权的阴谋……可见由己推人，有时候也会推出乱子的，足以使后现代主义的迷茫不无依据。但是，无论人间事怎样千差万别，无论利益解释可以怎样多样化、主观化以及感觉化，只要人还是人，酷刑和饥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成为美事，鲁迅笔下的阿Q把挨打当胜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性。这就是说，道德仍具有一种普世标准的客观通则，多样性中寓含着同一性——对当代哲学深为不满的法国人家阿兰·巴丢，将其称为“一个做出决定的固定点”和“无条件原则”（见《哲学与欲望》）。这确是一个问题，一个当代精神的命门：因为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利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任何仁慈都涉嫌强加于人的胡来，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可能的恩惠；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宗教的信仰，理性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了无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这种糨糊状态，毒奶粉也就不妨亦善亦恶了——不过这就是哲学书虫要干的事？就是他们忙着戴方帽、写专著、大皱眉头的职责所系？就是他们飞来飞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评审会的专业成果？他们专司“差异”，擅长“多元”，发誓要与普遍性、本质性、客观性过不去，诚然干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漂亮活。但如果从过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虚无论，在一袋毒奶粉面前居然不敢生气，就只能活活印证“多方丧生”这一成语：理论家的药方太多了，无一不是妙方，最终倒让患者无所适从，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编辑/张定浩